

黎东方与民国时期的“细说体”

李兆健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在抗战时期,时任大学用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的黎东方,由于生活拮据,公开作历史故事演讲,因而被后人称作“卖票讲史第一人”。20世纪60年代,黎东方结合当年在重庆讲史的经验 and 风格,创作了《细说清朝》《细说三国》《细说明朝》等系列作品,黎东方称其为“细说体”。“细说体”实质上并非是全新的历史体裁,而是历朝断代史的一种通俗写法。“细说”系列作品以其辩证翔实的内容,深入浅出的表述,为后世通俗史学读物的写作提供了借鉴,推动了史学通俗化的发展。

关键词:黎东方;细说体;通俗史学读物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3-0006-04

黎东方(1907—1998),原名智廉,河南省正阳县皮店乡人。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其父黎淦,清末举人,仕于江南。“他髫龄随母居江都,先后就学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北京清华大学,在清华攻史学,为国学大师梁启超最后之及门弟子。”^{[1]56}后赴欧留学,师从巴黎大学马第埃教授,攻读法国大革命史。在此期间,凭借出色的论文《比列志事记》(Les comités et les clubs des patriotes belges et liégeois, 1791-an III),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并被授予“最荣誉记名”。“在十九世纪的一百年中,获得此项荣誉的是文学家泰音与史学家古朗希二人,黎东方为二十世纪的第一位被授予者。”^{[1]173}归国后,黎东方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职。抗战时期,出于生活所迫,黎东方先生在重庆、昆明等地公开卖票讲史,引起轰动,受到众多听众的追捧。1960年,在其挚友黄季陆、倪炯声的劝说之下,黎东方结合自己当年讲史的风格,开始着手创作《细说清朝》,载于《新生报》,于两年多后连载完成。其后又陆陆续续创作了《细说三国》《细说明朝》《细说隋唐》等系列作品,从而形成被后人熟知的“细说体”。本文拟从黎氏讲史经历,“细说”系列作品的具体风格特点以及其对于后世通俗史学读物创作的影响等方

面,解析“细说体”。

一、西南讲史

自1931年归国后,黎东方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职,主讲中国通史和历史哲学。但由于黎东方常年接受的是西方历史学教育,治学理念及方法与传统史学课程有差异,“屡次与学生发生齟齬,遂拂袖而去。”^{[1]184}此况也是因北大学生颇具独立意识,而黎氏又脾气倔强。1939年,黎东方应朋友陈立夫之邀,至重庆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并兼任大学用书委员会秘书,还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课,以及国防部政治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兼职。然而受战争影响,国事蜩螗,公私皆困,黎东方每月收入仍然入不敷出。熟思之下,黎东方登报公开作“历史故事演讲”。

公开讲史,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场馆问题。黎东方联系到其好友、时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王伯立,免费借到了剧院的大礼堂。其次,又在《中央日报》刊登广告,宣传卖票讲史。万事俱备后,黎东方于1944年9月24日在山东省立大剧院公开作《三国》演讲,以合久必分开场,分久必合结尾,一连十天,听众场场爆满。黎氏的门票并不便宜,为每日四十法币(当时一法币的购买力

收稿日期:2020-02-12

作者简介:李兆健(1998—),男,江苏盐城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专门史。

约合四便士),^[2]然而听众依旧络绎不绝。

黎东方的讲座之所以受到民众欢迎,究其原因有三。其一,黎东方本人才学渊博,精通国内、西方通史,而口才又佳,演讲时常常妙语连珠,风趣诙谐。曾多年担任蔡元培先生秘书兼家庭教师的余天民先生有诗赞曰:“风流大雅驾曹刘,彩笔光耀五凤楼。谐谑巧将三国述,抑扬能使六朝愁。中原气旺生才子,蜀道天高纪胜游。额手奚囊多锦句,归来许我细搜否?”^[3]其次,黎东方讲史所选取的题材契合时局,大多以三国为主,又讲唐朝与清朝。此时已到抗日战争后期,军民俱疲,而西南地区又是抗战的大后方,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之地。“受了黎东方教授讲说三国的影响,近年舆论界好谈三国,尤其好谈论偏安四川的刘家天下。”^[4]六出祁山、匡扶汉室、三顾茅庐的历史故事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其三,就是黎东方先生严谨的治学风格。黎东方先生早年在清华求学时,在史学方法论上得到了梁启超、孔繁需的指点,又深受伯伦汉、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等年鉴学派学者的影响,具有相当深厚的史学功底。归国之后,黎东方参与法国史学著作——《人类进化史》的编译工作,^[5]治史风格愈发谨慎。虽说黎东方是以口头表述的形式来述说历史故事,但其是细说历史,而不是戏说。著名史家邓广铭是这样评价黎东方的:“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借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穿……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源,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6]由此可见,黎东方公开讲史,有别于先前市井勾栏的说书或评书,以严谨的史料论证为基础,辅以幽默风趣的口才,造就了民国时期“讲史第一人”的创举。

二、创作“细说”系列

1945年后,因时局动荡,黎东方前往美国。在赛珍珠女士的邀请下,帮助其创办《亚洲杂志》。后相继在福尔蒙大学、布鲁克林纽约市立学院、堪萨斯大学等高校任职,主教中国通史及远东局势。黎东方在布莱德雷大学任教时,在报纸上撰写“东方分析”(The Orient Analyze)的专栏,后结成单行本发行。其间在亚洲研究院工作室,

曾出版过两本中篇指导书,一是《古代中央亚细亚研究指南》;二是《二十世纪的维吾尔语语汇》。1960年,黎东方第三次返回台湾,受到了黄季陆、倪炯声两位老友的劝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应该向你进一句忠言,你国外跑来跑去,跑不出什么名堂。教国外小孩子,‘人、手、足、刀、尺’、‘大狗叫,小狗跳’,没什么意思,倒不如静下心来,写一本像样的书”,于是黎东方开始创作《细说清朝》。

关于“细说”一词的由来,黎东方先生是这样解释的:“一桩桩,一件件,你听我细说……端详。”而从清朝写起,则是因为黎东方志在讲述全部中国历史,然而太长。不妨先谈清朝,然后由下往上推。之后,《细说清朝》开始在《新生报》连载,并于两年后连载完成,受到诸多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此书外貌虽似通俗,而内容立论不苟,深合史法。”(钱穆)^{[1]322}“史笔清丽,为当今所罕见。”(唐君毅)^{[1]322};童常先生又有二律纪《细说清朝》云:“谐中时雅复时庄,纪事撰文最擅长;妙有清朝能细说,从无才子不堂皇。点头顽石千人赞,乱坠天花四座香;赢得鸿妻开口笑,东方朔后一东方”。“十五年前唱郢腔,嚶鸣回首忆巴江;三编会外谈三国,万卷楼中述万邦。输府昔惊才少匹,说郭今羨笔无双;清风也爱觉罗史,几度飞花扑北窗。”^{[1]324}

其后,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黎东方相继创作了《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民国》《细说三国》《细说史前中国》等作品,但因历史遗留问题,这些作品都只在台湾或美国出版,并未在大陆发行。直至1995年,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崔美明联系上远在大洋彼岸的黎东方,敲定了上述“细说”系列作品的合同,并邀请了著名学者邓广铭、唐振常、顾毓琇作序,于1997年相继出版。^[3]

三、“细说体”的史学特征及价值

1. 断代史之通俗写法

“细说”系列实质上是断代史的通俗写法,并非史学体例上的创新,原因有二:其一,其系列作品都是以朝代为框架的,例如《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等;其二,“细说体”都是以人物、事件、官制、改革等内容为基本章节,串联起来叙述一个阶段的历史,可以说是纪传体断代史的通俗作品。正如刘知几对此体裁的评价:“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7]下面以《细说明朝》为例:

《细说明朝》全书共九十九章节,其中朱元璋、韩林儿、张居正等人物传记共五十三章,可看作是传统纪传体史书的“传”;元朝内斗、成祖西征、土木之变等重大事件共十四章,可看作“纪”;军民分籍、五军都督府、十三道等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共十七章,是为“志”;勋臣后裔、永乐文臣、北元世系等世系、人物关系共十章,即为“表”;其他四章。

在史书体例中,纪传体断代史向来受到历朝历代的青睐,一方面它混合了多种体裁,另一方面又有相对固定的规格,是以本纪和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演变发展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而其优点就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细说体”正是将这种写作方式用通俗化的语言加以描述,但也并非完美无瑕。从“细说”系列作品的框架来看,都是将数十个乃至上百个部分并列书写,不分章节,不分主次,事件与人物之间没有清晰的划分,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难以抓住重点,分清主次,阅读的连贯性会受到干扰。

2. 考证与勘误

“细说体”是黎东方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而完成的,而其突出的史学特征主要是两点:一是考证;二是勘误。

历史学的基础就是史料与考证,傅斯年甚至有“史料即史学”的论断。虽然黎氏作此著的出发点即为向普通读者普及历史,但其中依旧花了大量篇幅对一些史料进行详细的考证:

《明朝·鞑靼传》是一本流水账,账上所记的是某年某处有鞑靼人入寇。但撰述人对于鞑靼的国内政情,甚至其君主传袭世系,一概茫然无知。

我们必须参考柯劭忞《新元史》里面的“宗室世系表”,才能够略知道“北元”的世系。但是柯劭忞把年代弄错了很多,也把君主们的名字故意写得与《明史》所记载的不同,给研究的人增加困难。因此,我们又必须参考张穆的《蒙古游牧纪》及其所引的小彻辰萨囊台吉的《蒙古源流》,才勉强可以摸清这“北元”世系的一个大概——也只不过是一个大概而已。

“北元”这个名词,是高丽人所创造的,比“鞑靼”两个字公平得多。直到崇祯八年为止,“北元”始终与明朝对峙着,其情形犹如金与“南宋”,虽则地域迥异。明朝有过十六个皇帝,北元有过

二十八个君主。^{[8]43}

上述文字,说明黎东方在撰写《北元概述》一章时,首先对所涉及史籍进行了考证,列举了相关史料的优点及缺憾,取长补短,辩证看待,有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次就是勘误。“细说体”中对于历史演义乃至正史中的谬误都加以纠正,以正视听。例如“胡惟庸案”:

……次月,涂(涂节)正式“上变”,告胡惟庸谋反。(但仍不告发李善长、李存义、李佑、林贤、陆仲亨、费聚,可能是胡惟庸不曾把这些人已入了伙的事告诉涂节。)差不多同时,一位曾经做过御史中丞而被胡惟庸降为中书省的小官的商嵩,也把胡惟庸的若干秘密,告诉了朱元璋。

《明史·胡惟庸传》说,在涂节上变与商嵩告密以后,朱元璋便逮捕了胡惟庸。

《明通纪》说,胡惟庸之被逮捕,是因为朱元璋于被请驾临胡府,观看井中所出醴泉之时,被一个宦官云奇拼命阻拦,于是走上宫城城墙,见到胡府里面,有“裹甲”的人,“伏屏帷间数匝”。胡府在细柳巷(其后的广艺街),确是离开宫城西华门不远,然而朱元璋怎能看到屋瓦之下、屏帷之间的裹了甲的人?《明通纪》的记载,可谓荒诞不经。^{[8]93-94}

3. 对史学通俗化的贡献

史学通俗化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迎合了被正统史学排斥在外的普通大众了解历史的需要,宋元时期的讲史、评话,明清时期的通俗读物,使得史学开始广泛传播,为普通百姓所接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用白话文编写通俗史学读物又成了史学传播的新形式。而通俗化是相对于传统史学的“科学化”“专业化”而言的,在保证基本史实正确的基础之上,运用各种具有文学性的写作手法,达到对大多数普通民众传播史学知识的目的。因此通俗化作品与传统史学家秉笔直书、鉴戒垂训的精神存在一定的矛盾,其出发点是为了传播基本史实,培养民族历史认同感,而非史学研究。但一位没有接受过正统史学理论学习的作者,又难以把握史学写作技法,以致纰漏百出,贻害无穷。

正如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述:“只是觉得学术文章,不一定必须行文枯涩。言而有据,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学。美国文史学界因受自然科学治学方法之影响,社会科学之著述

亦多诘屈聱牙,每难卒读。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9]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上并不缺乏历史读物,但大多都是死板、生硬的记史流水账,要不就是阅读门槛极高的史学研究作品,缺乏适合一般历史爱好者阅读的通俗作品。由此可见,黎东方创作“细说体”尤为可贵。“细说体”选材严谨,叙述慎重,体现了黎东方是为了向普罗大众传播历史知识,而非哗众取宠,将史学娱乐化。

四、结语

黎东方在八十余年前的西南讲史,开创了公开卖票讲史的先河,普及了史学知识,弘扬民族主

义,鼓舞了抗战时期的人心,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于六十年前创作的“细说体”系列是杰出的通俗史学读物,结合现代文学手法书写纪传体断代史,文笔幽默、富有趣味,论据充足、结论严谨。虽然全书在总体结构存在主次不清、划分不够清晰的缺憾,并且对于通俗史学读物而言,依旧缺少必要的论据注释,但瑕不掩瑜。总体来说,黎东方的“细说体”在形式、内容、语言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创新,使后人明白即使是严谨的历史学术文章,也可以用浅显的文字表达出来,对于后世历史通俗读物的创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黎东方. 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 1907—1998[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
[2] 齐春风. 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J]. 近代史研究,2003(5):137-169,317.
[3] 崔美明. 中国卖票讲史第一人黎东方[J]. 世纪,2007(5):56-59.
[4] 常乃德. 蛮人之出现·谈谈刘备[M]. 香港:文海出版社,1967:360.
[5] 黎东方. 我对历史的看法[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294.
[6] 邓广铭.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3.
[7] 刘知几. 史通[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5.
[8] 黎东方. 细说明朝[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9] 唐德刚. 晚清七十年[M]. 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3.

Li Dongfang and "Xi Shuo Ti"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LI Zhaojia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i Dongfang, who was the standing member and secretary of the University Book Committee, was known as "the first person to sell tickets to tell history" because of his poor living and made a public speech on historical stories. In the 1960s, Li Dongfang combined with his experience and style of lecturing history in Chongqing, created a series of works, such as *Xi Shuo Qing Dynasty*, *Xi Shuo the Three Kingdoms* and *Xi Shuo Ming Dynasty*. Li Dongfang called them "Xi Shuo Ti". In essence, "Xi Shuo Ti" is not a new historical genre, but a popular way of writing dynastic history. With its detailed contents and simple expressions, the series of "Xi Shu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writing of popular historical books in later generation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ization of history.

Keywords: Li Dongfang; Xi Shuo Ti; books for popular consumption

(责任编辑:陆 勇)